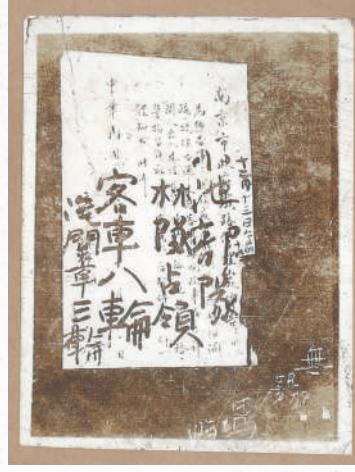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12月13日是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本报推出一组文章，深切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伟大的抗战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克服艰难险阻，一路前行。

——编者

## 这本相册缘何成为“京字第一号证据”

张国松



▲罗瑾、吴旋冲印保存的16幅侵华日军暴行照片相册封面。

◀反映侵华日军在南京抢掠搜刮财产的照片。

以上图片均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今年热映的电影《南京照相馆》讲述了主人公冒死收集和保存南京大屠杀罪证照片的故事。而在历史上，确有一本相册有16张反映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在战后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案主犯、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团长谷寿夫时，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法庭上出示。

这组照片包含怎样的历史信息，为何有如此高的历史档案和证据价值？

这16张照片反映的是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屠杀、侮辱妇女、抢掠搜刮财产等暴行。有6张照片是一个日本兵手持军刀砍杀中国人的一组连续画面，周边还有一群日本兵围观。照片中还能看到，围观的日本兵中有人手持相机，正在拍摄屠杀场景。有两张照片反映的是被日军屠杀后的惨状，其中一张照片，水塘中和水塘边有漂着和堆着的尸体，水塘中还能看到两个活着的人；另一张照片中，一具具双手被捆绑着的尸体密密麻麻地堆积在一起，旁边是一个牵着马、扛着枪的日本兵。还有两张照片是中国人被捆绑在柱子上，一个日本士兵端着刺刀狞笑着。一张照片中，一个日本兵正在强吻一名穿着旗袍、双手被迫蜷在背后的中国妇女。一张照片拍到了“南京市府铁路管理处布告”，上面赫然用日文写着“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前，小池部队林队占领。客车八辆、蒸汽机车三辆”；另一照片中，一段城墙旁，一个日本兵拦住了一个中国人搜身。相册背面用毛笔书写着“日军自行拍摄之暴行照片”字样。

据史料记载，日军在南京肆意烧杀淫掠的同时，为炫耀其“武功”，往往自行拍摄照片或电影，而这些影像日后成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直接罪证。这本相册仅仅是日军暴行的缩影，像这样由日军自行拍摄的暴行照片还有很多，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藏的日军伊藤兼男和村濑保相册等。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老兵和随军记者的日记、证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日记和书信、拍摄的照片和电影胶片（如美籍牧师约翰·马吉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也都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

这本相册的保存者——南京市民罗瑾、吴旋的讲述，以及提交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的呈文，证明了相册的流传有序。

1938年，在南京佑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当

学徒的罗瑾为一个日本军官冲洗两卷“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人和侮辱中国妇女的照片，于是就多冲印了一套。后来，他从30多张照片中选出16张装订成相册，并将其余照片销毁。为表达心中的愤怒，他在相册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右上方是一个美术体“耻”字，右下方是一把带血的尖刀，左上角是两颗鲜红的被刺穿的心脏，鲜血淋漓！

1940年，迫于生计，罗瑾被招募到汪伪政府警卫旅司令部通信大队学习。其间，他偷偷将相册转移到了通信大队驻地——南京毗卢寺。一天，日伪突然在寺内进行大搜查，他赶紧将相册藏到寺院后院茅厕的墙洞内。过了几天，他发现相册不见了，为了安全起见，决定立即离开南京。

同样在1940年，为了养家糊口，吴旋也应招到通信大队学习。一天，他在寺院后院的茅厕中发现一本相册，打开一看，全是日军暴行的照片，他赶紧将其揣进口袋，此后藏到了毗卢寺大殿内一座佛像的底座下。1941年秋集训结束时，吴旋偷偷从佛像底座取出相册，塞在自己的小皮箱底层带走。后来，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照片保存了下来，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听闻南京有关部门正在搜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吴旋将自己珍藏的这本相册呈交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并附呈文介绍了照片的来历，其中写道：“学友于南京开设照相馆，有日寇以其所摄照片至该馆洗印，俾作‘胜利’之夸口。民同学惧其淫威，不能拒绝，乃同时用其底片加印一份，共得小照片十六张，多为敌兵之罪行，或以残杀我同胞为笑乐，迄今视之犹有余悸。”

1946年10月，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在收到这本

相册和呈文后，经过调查，认定这些照片为侵华日军自行拍摄，并将照片和呈文紧急转交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为审判日本战犯的证据。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公函》记载：“查该项照片确系日寇施行暴行时所自摄，而足为证实战犯罪行之铁证用。”据1946年10月20日的《新民报》白刊报道，当检察官将相册交给谷寿夫看时，他“两手发抖，以致本子掉到地下，又捡起来详看”。

1947年2月6日至8日，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时，这本相册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法庭出示。同年3月10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出最终判决，判决书中明确指出了这本相册作为重要物证的作用：“并有当时日军为炫耀武功，自行拍摄之屠杀照片……”4月26日，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在肯定“京字第一号证据”的历史档案和证据价值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知道，南京审判时，法庭搜集的证据多达四五千件，证人多达500余人，这些证据和证言对日本战犯的定罪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庭的判决书认定：“计我被俘军民……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十九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十五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三十余万人。”

2015年10月，这16张日军罪行照片作为“南京大屠杀档案”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重要的世界记忆遗产，南京大屠杀历史由个体记忆、城市记忆、国家记忆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如今，这本相册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复制件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开展示。

（作者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研究馆员，本报记者尹晓宇采访整理）



缪克强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

## 百年黔照归故园

刘秀丹

2025年7月31日，一场捐赠仪式在贵州省博物馆举行。79岁高龄的朱延琦先生在家人陪伴下，将家族珍藏近百年的43张民国时期老照片郑重移交给贵州省博物馆。这批影像资料中，42帧大夏大学西迁贵阳期间拍摄的贵州苗族风情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如同穿越时空的密码，解锁了一段尘封在抗战期间的文化守护往事。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受重创，大批高校被迫踏上南迁之路。大夏大学西迁贵阳，成为较早西迁的高校之一。彼时，西南边疆的稳定和民族团结直接关系到抗战大局。大夏大学遂将“社会经济调查室”改组为“社会研究部”，由文学院院长吴泽霖主持，肩负起民族调查与凝聚抗战力量的使命。

从1938年至1940年，社会研究部足迹遍布安顺、炉山（今凯里市）、黎平等地。这一时期的民族调查，促成了吴泽霖由社会学到人类学的学术转向；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做深入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厘清汉族、苗族、布依族、水族等民族之间内在的共同性，从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共同抗战。

调查期间，社会研究部拍摄数百帧民族影像，朱延琦先生捐贈的这批照片，即当年调查成果的一部分。吴泽霖精选代表性作品汇编《苗胞影答》，计划分辑出版，然受时局与经济所困，仅第一辑问世，其余多已散佚。1941年吴泽霖转赴西南联大后，仍持续民族研究，1943至1945年间兼任昆明译员训练班副主任，培养大批美军译员，为抗战胜利助力。

吴泽霖在西南边疆奔走的同时，籍贯贵州紫江（今开阳）、一生未踏足故土却以“紫江朱启钤”自居的学界泰斗、实业巨擘，在日占区北平书写着另一段文化守护传奇。朱启钤早年投身政治，1919年转投实业，1930年组建中国营造学社，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拓者。

1937年北平沦陷后，梁思成、刘

（作者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 文化遗产

本版邮箱：ysbjs@people.com.cn  
本版责编：周飞亚  
版式设计：沈亦伶

1937年7月，严济慈正代表中国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文化合作会议，七七事变消息传来，他在讨论保护文物的议题时发言：日本侵略者已经扬言，威胁要轰炸北平。北平是闻名于世的千年古都，我提请世界舆论公开谴责日本侵略者这一毁灭文化的罪恶企图。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文化发展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奉行“脱亚入欧”，走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攫取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珍贵文化遗产，成为其施行殖民扩张的重要方式之一。

早在甲午海战时期，日本就草拟《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提出：“搜集”清国文物，目的在于证明日本是“东洋学术之大本营”，取代中国成为亚洲文明的代表；而战时“搜集”文物便于获取、价格低廉、方便运输，具有平时无法比拟的优势。该文件还列举了“搜集”中国文物的方法，要求“搜集”、运输、分类各环节均须受军队长官的指挥和监督，以确保“搜集”到的文物由皇室御藏或由帝国博物馆收藏。

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大肆掠夺我国公私图书特别是珍稀典籍，洗劫珍贵古迹及重要文物，盗掘地下文物和考古资源。战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调查编写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列书籍、字画、碑帖、古物、古迹、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等各项公私文物损失共3607074件又1807箱，古迹741处。委员会还编制出版了《甲午以来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收录甲午战争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日本劫夺的各类文物15245件。由于调查和申报时间有限、程序复杂等原因，这些数据和资料记载的只是我国被掠夺文物的一部分，无法全面涵盖日本掠夺中国文物的实际情况。

（作者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 印章传承“铁汉精神”

鲁晓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诸多展品中，戴安澜“铁汉”印章及挽联存根簿背后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方玛瑙印章，阳刻“铁汉”二字，篆体，布局端庄、笔画遒劲；一本泛黄存根簿，收录着各界人士的挽诗、挽词、挽联。

戴安澜（1904—1942），安徽人，在台儿庄战役时期自号“铁汉”，并镌刻此枚印章，以表达用钢铁般意志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坚定信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席卷东南亚，应盟军请求，中国派出远征军赴缅甸作战。1942年3月，戴安澜任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师长，率部先期入缅作战。孤军深入的境况下，他在遗书中写道：“现在孤军奋斗，决心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当年3月18日至29日，200师在东瓜陷入苦战。没有空军协同，面对四倍于



▲戴安澜“铁汉”印章。

▶冼星海的入党申请书。

以上图片均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提供

已、配备特种兵与空军的日军，戴安澜指挥步兵顽强抵抗，苦战12天，歼敌约5000人，成功掩护英军撤退。5月18日，部队在郎科地区与日军遭遇，激战中戴安澜不幸重伤；5月26日，他在缅甸茅邦村殉国，年仅38岁。

戴安澜的遗骸经云南腾冲回国，一位老华侨感其忠勇，献出自家电木棺殓其遗骸。遗骸归国后，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1943年4月广西全州公祭时，治丧委员会记录各界挽诗、挽词、挽联的存根簿，将这份哀思永久留存。存根簿中的一、三册印有毛泽东、周恩来及邓颖超赠送的挽诗、挽词、挽联。

2005年，戴安澜子女将“铁汉”印章与挽联存根簿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如今，这两件一级文物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第四部分展出。这不仅是对戴安澜将军“铁汉精神”的传承，更以实物印证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坚定决心，也彰显了抗战的民族凝聚力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 冼星海的入党申请书

### “生命上最光荣的一天”

陈亮

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第三部分展示根据地文化教育和社会建设的展柜中，陈列着一份珍贵的档案。红色方格纸上，钢笔书写的文字个别修改，字迹清楚：

我觉得自己创作幼稚，政治认识太薄弱，因此希望能接收（受）党的领导，从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创作。我常觉得不加入组织成了离开党的领导一样渺茫似的，因此愿加入党，同时希望党能吸收音乐的专门人才（才），使党的各部门，都同时雄（壮）大起来，在新中国建设或在抗日的战争，成为一支不可侵犯的力量！我像许多青年人一样，愿意把自己献给党！（关于入党的手续已与赵毅敏同志说过，他愿意作介绍。）

落款为“冼星海，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鲁艺延安”。

这是1939年5月15日冼星海书写的入党申请书。

冼星海（1905—1945）是中国民族新音乐事业的先锋，被誉为“人民音乐家”。1935年，他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回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建歌咏队，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保卫卢沟桥》《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歌曲。1938年11月，冼星海辗转抵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1939年春，与光未然合作谱写了《黄河大合唱》这一中国抗战音乐里程碑式的划时代巨著，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号角”。

赵毅敏（1904—2002），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9月代表中共满洲省委起草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号召中国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的第一篇宣言。1939年5月，赵毅敏担任鲁艺副院长，注重培养文化新人。他经常和冼星海促膝谈心，鼓励他发挥聪明才干。冼星海逐步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以自传的形式向鲁艺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回忆了小时候、巴黎求学、回国后、到延安后等各个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认识，详细叙述了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表达了入党的殷切希望。

1939年6月14日，冼星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就算我入党的第一天，可以说是生命上最光荣的一天。我希望能改变我的思绪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奋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 抗战期间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

胡珊辰

日本掠夺中国文物的方式多种多样。日军成立专门机构，组织专门人员，对占领地区的公私文化机构进行掠夺。日军还配备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文物搜集员”，对文物进行搜索和甄别。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组建“特别行动队”，有计划地对多处可能存放重要书籍文献和珍贵文物的公私文化机构和古迹进行调查，“搜集”和抢夺文物。在其他地区，日军也公然“扫荡”和占领公私博物馆、图书馆、教育机构、宗教场所，强索劫掠其中的文化财产。所抢文物或被运往日本皇室陈列，或由日本政府、学术机构及私人分藏。

日本自19世纪末就一直通过所谓“考古”的方式盗掘中国地下文物资源。大谷光瑞领导的探险队20世纪初3次非法考察库木吐喇石窟和克孜尔石窟，盗掘苏巴什古城和楼兰古城遗址，掠走敦煌文书500余卷，吐鲁番文书7000余卷，以及大量木简、壁画、雕像、丝织品等珍贵文物。九一八事变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等具有浓厚官方背景的企业和学术机构开展了许多具有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的文物盗掘活动。如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发掘窃取了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的资料5600多件、石刻资料8000多件。七七事变后，日本的盗掘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元上都遗址、安阳殷墟等许多遗址和古墓葬均遭其盗掘。

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分别通过的海牙第二公约和海牙第四公约均附《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要求各国在战争中尽可能保全用于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物，使其免于军事行动的破坏，并禁止任何没收、毁灭和故意损害这些机构、历史性建筑物、艺术和科学作品的行为。中、日两国均为公约缔约国。然而，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大量古建筑和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以及它们之中的珍贵文物进行轰炸、焚烧、肆意捣毁，显示出其对公约的无视。1937年日本侵占北京大学后损毁了文科研究所珍藏的《艺风堂》碑帖。1938年4月，岳麓书院御书楼、半学斋、静一斋等在长沙轰炸中被毁。日军的掠夺和破坏导致中国博物馆数量骤减，由战前的37家减少到18家，大量馆藏和民间收藏文物消失。

当前，战争掠夺文物应予返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识。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国家加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合作，对于因被盗、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保留收回的权利，为推进日掠文物追索提供了法律支持。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